

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史料

張哲嘉**

時間：民國九十二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2：30-5：00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

王德毅 王鴻泰 朱 鴻 文仲瑄 何淑宜 呂士朋 宋惠中

吳大昕 巫仁恕 林麗月 邱仲麟 尤淑君 徐 泓 張 璉

張哲郎 陳怡行 陳啟鍾 鄭樑生 賴惠敏 吳正龍 張皓政

張繼瑩 謝崇熙 唐立宗 吳惠雯 林修合 陳怡行 翁建鍾

精確度向來是中國地圖學史家關心的焦點。歷來研究特重圖法的進步，所以一直是將西晉裴秀、唐賈耽、北宋沈括、元朱思本、明羅洪先、然後是耶穌會教士等精準圖法的巨人，先編成地圖學主流的發展譜系，然後再以這幾位明星為座標軸，排比出其他地圖在地圖學史發展過程的地位。近年來馬王堆、放馬灘等上古地圖相繼出土，一向深藏宮廷的明清大規模水利工程圖也逐漸公開，世人驚詫於這些地圖的精密水準，從而開始重新評價古代中國人製作地圖的能力。

但我認為這些新認識要挑戰的其實不該是對古代製圖能力的評價，而是研究古地圖的看法。因為近來對中國古地圖的新認識已經觸及一個雖基本卻又被一直為人所漠視的問題：為什麼傳統中國會畫出這麼多粗略簡陋的地圖？這個問題在其繪製能力獲得肯定之後更顯得難以逃避。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成本考量或者繪圖者個人的怠惰都可能降低個別地圖的品質。但光這兩點顯然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歷史學家最常碰到的古地圖——方志地圖——是如此普遍地讓人不滿。很多證據顯示，方志不但深受帝王和地方官的重視，鄉紳也把修纂新志看作是地方隆重的大事。^[1] 在眾人殷切期盼下誕生的一部部方志，學者對其地圖的評價竟仍然只停留在「不精」^[2]，或是因「不能呈現數量化資訊」而「無法依賴」。^[3] 只是，就算真的滿足「精」而且在客觀數據方面「可依賴」，難道就符合了前人修志的理想標準嗎？

無論如何，在長久以來禮讚精準的思惟模式下，現存地圖史料中為數最夥的

方志地圖中，只有準確度較高的少數志圖才曾有幸得過研究者的青睞。如胡邦波以其高度的地圖學專業知識與實際地理資訊的掌握，詳盡分析過宋代《景定建康志》、元代《至正金陵新志》、以及明《萬曆永安縣志》與《萬曆惠州府志》這些採用計里畫方畫法的地圖，紮實地檢驗過這些地圖的內容，並對其準確程度予以相當程度的肯定。^[4]此外，夏黎明研究清代台灣地圖的演變時分析過不少方志地圖，研究旨趣也是在了解製圖方法典範朝向「進步」演變的問題。^[5]他們的研究成果都給未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和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最接近，而且多方啟發我的，是葉凱蒂有關上海華洋地圖的研究。她的論文拋開了精準度的枷鎖以及地圖陳述客觀事實的假設，把洋人畫的地圖和品質與之望塵莫及的上海方志圖放在同一個天平上等量齊觀，看這兩種地圖所描繪的世界各自反映了什麼樣的文化意識，又如何為定義上海未來的權力而互爭雄長。這些見解不只對方志地圖的研究頗有貢獻，就整個中國地圖學史來說，都是極富開創性的。^[6]

相對於葉凱蒂用幾幅地圖去研究特殊的上海，本文更有興趣的是要廣搜樣本來探索普遍的中國。從現代的眼光看，除了那些被研究過的地圖還算過得去以外，大多數的方志地圖是粗略的，內容也並不有趣。如果要說方志中哪一部的修纂最為慎重，或許應舉中央官修的《大明一統志》（1461）為代表吧。但是其中的「大明一統之圖」，所收載的內容只有京城、各省省名、以及五嶽四瀆而已（圖1）。^[7]這樣的圖解不但不能幫助我們瞭解各省之間的邊界，而且也描繪不出各有的地理特徵，就現代的觀點來看幾乎沒有地理學價值。但是我認為不應該只因為他們粗略就把他們置之不問。重要的是，這些粗略的圖畫想畫出什麼。事實上，我們以下將會看到，的確是有一些相當精密的方志地圖問世，而且那精密的圖法廣為人知，絕非密傳。但是大多數的方志編纂者仍然相繼不絕地採用了那些較為粗略的地圖表現形式。對他們來說，那些精、粗的圖各自有些什麼不同的意義？中國人堅持要重複畫這些粗略而且不太有意思的地圖，又有什麼目的呢？

在回答這些問題前，必須要先了解整個方志地圖傳統的表現方式。在初步瀏覽過歷代方志後，我想在這篇文章集中討論明代，作為研究方志地圖、乃至中國地圖大傳統的起點。我這樣決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在現實上我不可能在短期內看完宋、元以下所有的方志地圖。如果要取時代為斷限，則宋、元留存者稍少，現存者的代表性也難以回答，而清乃至民國以後則又太多，所以數量並不算少、卻也可能大致全面瀏覽的明代應是合理的出發點。所以我將以國內可以看見的《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明代方志選》、以及若干地圖集作為素材，研究明代的方志地圖。^[8]

第二個理由是，清代的方志有許多摻雜了西洋地理知識的問題，內涵較為複雜。^[9]或應先研究了中國本身地圖傳統內部發展到極致的結果，再來分析摻雜後的情形比較合適，所以得要先了解迄於明代的發展。^[10]必須在此提出的是，本文雖以明代為題，絕不暗示所討論的地圖表現特性是明代所獨有。只是要指出明代的地圖所具備的特性而已。除了上述縮小範圍、集中焦點之便外，也是要給日後討論哪些特性承襲前朝、哪些又被後世延續等演變的可能預留空間。話說回

來，從目前可以看到最早的宋代起歷代相承不絕的志圖，難道是陳陳相因、千年不變的嗎？

事實上，我瀏覽過歷代的方志後有一些初步的觀察，那就是比起之前，方志地圖在明中葉以後似乎有趨於簡單的傾向。現存的宋、元方志地圖的內容普遍來說較為多元，版面也比較擁擠飽滿。當然，我不是否認明代也有頗為詳細；宋、元也有比較簡略的圖的事實。但是一般而言，現存的宋、元地圖記載的資訊比較多，城圖中道路與建築之間的關連性也大多清楚。有的境圖中會標注水車、花樓、鹽場；城圖中則有亭館、酒庫、藥市街、甚至於勾欄等經濟或日常生活的設施，並不只限於官方色彩濃厚的公署、官寺、城牆、堡寨等建築物。^[11]

除內容外，早期方志地圖也有後世罕見的表現形式。以 1324 年所繪製的「奉元城圖」為極致，整個城內的版面若非道路，全都標注上建築物的名稱，若無特定公共機能的部份也都寫著「民居」二字，表示這一帶是住宅區。^[12] 從某方面來看，已經和至少自十六世紀起具有人體解剖圖風格的歐洲城圖相似，沒有被繪圖者留下空白而不被註記的地方。^[13] 即使沒有詳細到這個地步，一直到《永樂大典》所收羅的明初方志，仍頗多具備地圖內容多元、版面飽滿的特點。^[14] 但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官署、學校漸形獨霸版面，雖不致完全將廟宇、橋樑、游觀等其他建築逐出地圖，但只見官署矗立的圖的比重確在上升。

以杭州城的志圖變遷為例，南宋咸淳本《臨安志》中畫有 546 個地名，到了嘉靖，並非正式方志的《嘉靖遊覽志》已經減為 232 個，到了萬曆的《錢塘縣志》更降到 70，所剩幾乎全部都是公署或官方承認的祠廟。^[15] 當然，從宋到明整體趨於簡單化這個觀察尚不過是個假說，其真實性與內涵都需要更遼密的研究來錘煉和充實。不過反觀目前學者對方志圖的處理，當是想要用來顯現中國城市形象時，就用宋代的作樣本^[16]；而要批評志圖簡略時又是取明代作例子，既是個不爭的事實，方志地圖長年發展下來可能有的風格變化，也就該是研究者要不斷提醒自己注意的問題。^[17]

這千年來方志地圖演變的全程，既無法在一篇文章中討論詳盡，也不可能在此勉強試論其演變的原因。此外，本文也不預備在沒有個別可靠的地理資訊的情況下，討論方志地圖的地理特性。因此，我將把討論重點集中在描述明代方志地圖的視覺特色，並且分析、闡釋其重視的表現價值。而將解釋其地理、文化背景的工作留給更有資格的學者去做。在視覺表現方式上，由於明代政府從來沒有設定一套規範來地圖的格式，事實上，也沒有證據說明地方遵循著某一套系統定期造送中央，各方志的內容、畫法也就眾聲喧譁，難以進行研究。有鑑於此，我將採取的分析策略，是先討論遵循明代地圖學極致的《廣輿圖》的兩部方志地圖的特性。然後在他們的對照下，再映射出眾多各行其是之地圖表現方法的最大公約數。在討論其視覺表現的特色之餘，我將進一步去追問一般方志地圖的繪者是怎麼去看一個地方，從什麼角度去看。這將有助於認識中國繪製地圖的大傳統。而在瞭解了這個傳統之後，我們將可以跳脫以精準為中心的思惟方式，從而以新的想法了解中國的地圖史。

《廣輿圖》式的方志地圖

儘管方志學的研究成果極其豐碩，但有關地圖的卻是絕無僅有。我們對方志地圖的種種資訊，包括地理情報的來源、繪圖者是誰、乃至於繪製方法等方面的訊息，幾乎一無所知。至於方志地圖的功能為何、表現了些什麼，雖偶有方志〈輿地圖敘〉之類的短序，會說些要了解地理「非圖莫辨」，或者是地圖可以讓讀者知道「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一地的形勢也因此一目瞭然之類的話。^[18]然而，讀者究竟可以從這些圖瞭然些什麼，還有方志地圖究竟能提供多少具體的地理資訊，無不語焉不詳。相對而言，史家一向都不像方志作者般恭維傳統地圖，甚至有些西方學者懷疑中國方志地圖根本沒有任何測量基礎，不過是繪者的隨意之作。^[19]其實，繪測方志地圖的直接史料並非絕無，不過可能真的只是僅有。在 1586 年由郭之藩、葉春及所編纂的《萬曆永安縣志》中有一篇〈永安縣圖序〉，就明確記載：

永安初縣，山尤垂義，命虞道工，乘標以圖。圖凡四，都三而總一，參伍錯綜，博訪故老，三、四易而始就。^[20]

這段話說明了永安是一個剛成立的縣份。在編纂這個新縣的方志時，由於當地多山，曾大量利用登山的交通工具「標」以實地勘測地形，從而繪出全縣的總圖一幅以及縣下所轄三個「都」的分圖。並且在實測之外，還訪問故老，再三修訂、豐富地圖的內容。

除了有實測的文字記錄之外，圖法的淵源也有交代。永安縣的上級單位惠州，於九年後（1595）由程有守、楊起元纂修的《萬曆惠州府志》，就提及該志的〈永安縣境之圖〉乃取〈永安縣志〉既有的地圖改繪而成（圖 2）。另外還有九幅也是依循舊圖，只有一幅〈長寧縣境之圖〉新繪。這十一幅圖不論新舊，一律遵循羅洪先《廣輿圖》所用的圖法。這位或許是唯一在明代方志地圖留下自己名字的繪圖家陳一濂說道：

史氏曰：輿圖之法莫善於我朝羅文恭之《廣輿圖》，其後吾惠郡守顧公言作〈惠州輿圖〉仿之，時有工畫者，故其圖精絕。最後則郡人葉春及氏作《永安志》亦仿文恭圖之。而山川原委尤極纖悉。予今合兩家之圖而載之，惟創長寧一圖。

從這段說明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方志地圖的來源以及承襲的原委：羅洪先（1504-1564）在 1541 年前後出版的《廣輿圖》，受到顧言的注意，並在其惠州知府任內，仿效繪製惠州州境以及所屬各縣等共十幅地圖。後來由於行政區重劃，從其中的長寧縣獨立出永安縣，從而產生了編纂《永安縣志》的需要，遂有 1586 年之前葉春及測量繪圖之舉。到了 1595 年重修《惠州府志》時，就收錄了顧言的舊圖以及《永安縣志》不久前繪成的新圖。只是原來的〈長寧縣境之圖〉

包括當時的永安縣境，已經時過境遷，不復可用，所以就由陳一濂來重新「創」繪長寧一圖成篇，前後一脈相承。不僅如此，葉春及在《永安縣志》中還提到，他先前已曾把以記里畫方、使用圖例為主要特色的「羅文恭法」，運用在同屬惠州府下的《惠安縣志》和《順德縣志》的地圖上。只可惜這些圖都已經亡佚，今日已不復能窺其原貌。要言之，至少在萬曆年間整個惠州地區的方志地圖，由於顧言個人的興趣，偶然間創造了一個傳統，使得這段期間整個惠州地區的方志地圖全都宗法羅洪先《廣輿圖》來繪製。這個小小地圖傳統的成立過程，不管是從文獻證據來看也好，還是地圖的表現形式來看也好，都是相當清楚的。

這裡所提到的《廣輿圖》，曾有地圖史家譽為中國傳統地圖學發展的登峰造極之作。^[21] 中國地圖學自西晉裴秀（223-271）創制「六法」，建立基本原則的規模之後，到了元代的朱思本（1273-1333）再放異彩。朱思本除了自幼耽讀地理書籍之外，後來因從龍虎山張真人學道，得近天顏，常奉詔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他從而有機會結合實地考察與書本知識，修正先人圖籍的乖謬之處，為中國地圖學的成就再創高峰。他用了整整十年，於1320年繪成了長、寬各七尺的《輿地圖》。雖然在形式上承襲之前已有的「計里畫方」，但是在精度上更為進步。朱圖繪製成功後極受重視，曾被多次臨摹，還有人把圖刊刻在石碑上以便長久保存。但儘管如此，《輿地圖》的原圖最後仍然沒有逃過毀損的命運。若非羅洪先在這之前將其付梓出版，朱思本對地圖學的貢獻之功亦將如裴秀、賈耽，終歸只是傳說而已。羅洪先是嘉靖八年（1529）狀元，為著名理學家，此外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陰陽、算術等學問也都無不精究。他有鑑於朱圖過大，不便使用，乃根據原有的畫方，把單張的大幅分割改編成地圖集。他不但就各舊有小圖配合明代的地理名稱改繪，同時也擴充若干域外的新圖，總成《廣輿圖》一書出版。《廣輿圖》對後世的地圖有明顯影響，如汪作舟的《廣輿考》（1604?）、程道生的《輿地圖考》（1621~1627）、吳學儼等的《地圖綜要》、潘光祖的《輿地圖考》、乃至於整個清代沒沒無聞，卻為現代學者所重視的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1636），都可被稱作「廣輿圖系」、或「朱思本系」的地圖。^[22] 方志地圖的繪者也有人起而效法，就是這些16世紀下半繪製的惠州方志地圖。

這些惠州地區的志圖因為成功地結合了實測和極致的傳統圖法，得到現代地圖史家的高度讚揚，他們最欣賞之處就是精確。胡邦波明確指出，他認為這兩部方志的地圖最大的特點，就是繼承了羅洪先《廣輿圖》的「計里畫方」的方法繪製。他進一步指出這是目前學者所知整本方志地圖全採此法的首例，以現代的技術看來雖然比例尺還有些許誤差，但是已經相當精準。其次，這些地圖的另一項顯著特徵是採用統一的地圖圖例，這也是受到《廣輿圖》的影響。如在《永安縣志》的第一幅〈永安縣圖〉左下角就列有圖例，共用了11種地圖符號（圖3）。地圖學者認為使用圖例是地圖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其原因仍與準確有關，因為這樣的設計可以大幅提高地圖中指示地名定位的準確度。與此同等重要的優點是，由於採用了小面積的符號形式來表現，讓在同樣大小的地圖提供更多的數值載負量，亦即更多的地名或內容，亦即所採的畫法與意欲表現的內容之間達到良好的合作關係。第三，表現地圖主體的主區、以及鄰區間劃分地很清楚，也掌握

住了主區詳、鄰區略的原則，體現繪製者有明確的綜合取舍概念。胡邦波指出《永安縣志》的〈寬得都圖〉（圖 4）的主區數值載負量約為每平方公分 81.8 個地名，「已經接近現代 20 萬分之 1 地形圖的數值載負量。」所記載的內容包括了 1 座城、7 個鋪、11 個社、88 個村、5 個屯和 23 座山，一共有 135 個地名。^[23] 概言之，這些《廣輿圖》式方志地圖的優點可以簡單歸納為：比例與位置的準確、畫法與內容的配合、以及與鄰境關係清楚等三項。這些特點，無不讓抱持現代地圖價值觀的讀者激賞。

高度「羅洪先化」無疑是《永安》、《惠州》作為方志地圖最為獨特之處，不過，之所以重要恐不在於他們的精確。因為他們不過是重蹈前人既有的成就，就圖法進展來說無甚新意。而且即使是準確度或計里畫方的圖法，在志圖間也並非專美於前。前面提過，胡邦波曾撰文指出《至正金陵新志》地圖的精確度。這部方志的圖（圖 5）也畫方，但不用圖例，內容幾乎都是用有字的方框標注，畫方也是用一種類似長矩形的方式來表現。^[24] 從此可見，古代的地圖家在掌握了畫方的概念及技巧之餘，仍在地圖的表現風格有各自的決定空間。而《廣輿圖》式的圖法除了擁有地圖學標重視精確、數值量等價值之外，也不應忽略其本身也是一種表現形式此一事實。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萬曆年間惠州地區相繼採用《廣輿圖》式方志地圖的故事就有了新一層的意義。萬曆年間惠州地區方志的記載，不但呈現了一個區域志圖的小傳統從成立到承襲的過程，也說明了編纂方志時，選擇表現風格的自由度。難以用簡單方式描述、歸納、分析的方志地圖，原來就是這樣由各地方自主決定。

在各行其是的情況下，惠州的例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所選擇的表現形式，可資以對照出其他不採取此形式、各自不同的志圖竟似有一些共性隱隱浮現。換言之，所謂《廣輿圖》式地圖最有意義的特色，與其說是使用了最進步的圖法，不如說他們暴露出其餘地圖所意欲表現的共同興趣與趨向，並提供了超越於個別地圖的精粗、詳略、和繪畫筆法，而來討論所謂「一般」明代志圖特色的可能性。以下的討論也將不去詳辨地圖的個別性，而就前述學者對《廣輿圖》系地圖所提出的特點來與其他製圖對比，並以從所顯現出來大致趨同的共性，來討論明代中國方志地圖的風格。

餘論

這種從中央向外望，表現許多城牆與山川交錯、散佈在空蕩蕩大地的圖法並非方志的專利，也有其他輿圖採用。比如說與方志類似，都是記敘一方風土的《淮安府圖說》（1589？），筆畫頗為細緻，全書共有彩繪地圖 12 幅。值得注意的是，其畫法並未因為手繪容許更自由的畫風而改變，內容也未見更為豐富。圖畫的四周沒有界線、官署放大，並沒有什麼和方志地圖顯著不同之處。^[25] 所誇大的建築物，在城牆外畫成用平房的样子，城內的官署、儒學則全用文字表示，唯一的例外只有泗州內城右下角的高塔而已（圖 19）。^[26] 為了瞭解其畫風與方志地圖的關係，《中國古代地圖集》的編者特地找出了明代表現淮安府、州、縣的正德、萬

曆、天啟、崇禎四種《淮安府志》的刻本地圖來加以比較，但只得出繪本「村鎮居民點表示略詳」、刻本「山峰河道的表現略詳，各有側重」的結論。^[27]另外一種明代的省級地圖集，如絹本彩繪的《江西全省圖說》情況也差不多（圖 19）。^[28]這些圖有別於方志刻本之處，除了上色以及工筆之外，恐怕只是加上了一叢叢綠樹而已。除了這些仍然是空地一片。從此可見，採用這種簡略的形式來畫地圖，與繪者的勤惰無關，也並非是雕版之物質條件限制的結果。而是源自於一種表現地面、或者是觀看的傳統。

還有一些別的地圖也習慣用類似的形式表現，其中最主要的是軍事地圖。這當然可能與軍事地圖也和方志地圖一樣，是由守將從據點城內向外望，擬想敵人與其他據點的觀想模式有關。有名的海防兵書《籌海圖編》，如圖 19 所示的廣東沿海圖局部，大海在上，圖下面圍著「廣州府」、「番禺縣」、「南海縣」以及「廣東省城」這 13 個字的圓圓象形城牆，是全圖的焦點；右上大島的香山縣城圍次之。除了海洋、島嶼、山川、就是畫著插著旗幟的烽堠符號、以及內以文字註記的堡壘、巡檢司等長方格子而已。^[29]陸上的軍事圖也大同小異。如描繪北方邊防的〈三鎮總圖〉，就是山嶺、長城之間星羅棋布著一座座的方形城堡。比較特別的是、如〈山西鎮總圖〉、塞外有時繪畫著蒙古前人們在圍坐或走馬（圖 21）。^[30]當然，軍事圖以這樣的方式呈現也不會是因為技術的問題。具體的例子如 1472 到 1621 之間、紙本彩繪的〈江防海防圖〉，除了畫工遠較精細，形式依然大致相同。^[31]另一個有名的於 1534 絹本彩繪的陸防軍事用圖〈九邊圖〉亦出自同一風格（圖 22）。^[32]這幅圖和《全遼志》描繪邊鎮的〈全遼總圖〉（圖 23），都是邊牆內側密密麻麻排著一列註記為堡壘的長方格子，裡面也盡是櫛次鱗比地排列著大小城池與山川交錯。^[33]

比較接近比例的軍事地圖並非沒有，但是絕大多數的軍事圖還是採用了這種放大據點、忽略比例的方式來繪畫，不免讓人驚訝。^[34]因為這樣的圖既不能反映據點間的遠近、緩急，也難以顯示關隘要害在地理形勢上的優越性。若以傳統上擬喻大地與軍事形勢的圍棋來看這些具有相應意義的圖，明代邊防的棋局似乎未見高明，因為要著與閒子間的輕重之別，實在很難用他們的相對位置看得出來。〈全遼總圖〉還好些，〈九邊圖〉則顯現的似乎是據點的眾多與軍勢的壯盛。若要以圍棋來比喻，最多只能說那由遼邊密集的方格圍拱在內的重鎮所構成的圖面主體，象徵圍地內空白之處，都是在這些棋子的防衛下安堵的地盤。

不過，或許正是受到圍棋的啟發，才使得中國人喜歡用這種方式畫軍事、乃至於方志地圖。一顆顆彼此毫無差別、無個性的圍棋子放在棋盤上，就產生了形勢和力量。正如同軍事圖，方志圖也用一個個無個性的方框框象徵著國家的武裝、文化力量對於這塊土地的掌握。代表武裝力量的是城池、碉堡內的軍隊；而代表國家所遵奉之文化力量的，不正是官署、儒學、以及官方支持的祠廟嗎？那麼，壓抑了比例準確，以便讓那些文化棋子所象徵的勢力，能夠以當時「適當」的形式反映在地圖上的想法，也未嘗不能算是一種合理的地圖觀吧。

^[27] 前揭書，圖版說明，頁 2。

^[28] 前揭書，圖版 62-67。

^[29] 前揭書，圖版 195。

^[30] 前揭書，圖版 217-220。

^[31] 前揭書，圖版 6-11。

^[32] 前揭書，圖版 17-24。

^[33] 前揭書，圖版 203-204。

^[34] 如 1604-1605 之間用水墨摹繪的〈邊鎮圖卷〉，比例關係明顯較前述諸圖好，除了最重要的邊鎮外，也不用方框框包起文字，見前揭書，圖版 101-106。